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享誉世界宋史研究界已久的刘子健的成名作，本书竟然是在2021年才首次出版中文译本，仿佛与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评价一般，都经历了“迟来的平反”。

我想先单刀直入，谈谈作者行文的优点。

一，行文简约扼要，信息明确。作者既没有浪费时间在前人已经阐述过的问题上，不重复已有的研究（如萧公权的《政治思想史》），也没有为了“完整性”而讨论变法的所有细节，只是选取其中一部分深耕。全书仅八万字，却足以成为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名著。

二，视野宏大深刻。作者研究宋史的关怀之一，是通过宋代这一关键的节点，来理解中国值后近千年的历史过程。因此，作者在对王安石变法研究时，时刻关注到那些反映深层次的、结构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历史的视野极为开阔，得出的见解也殊为深刻。

但同时，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本书也有一些遗憾。

一，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究竟有何特殊之处，使之不同于其他的改革，如张居正的改革？也就是说，相对于王安石变法所期望达成的制度性效果外，宋朝是否有什么结构性的变法需求？如为何“三冗”的说法只在宋代出现而不见于其他时代？作者对变法的背景问题谈论较少，主要只谈了士大夫地位上升，但对于经济方面的缺陷未有涉及。

二，可能是因为作者专从宋史的资料向下深入，而未有“博取”，致使作者在本书中的一些判断，看似深刻，但经不起仔细地推敲，似是而非。如，朝廷中的权力斗争与中央集权化趋势有何关系？如果是以支持或反对的角度来说，无论变法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抵制中央集权。除此之外，权力的斗争与中央集权问题便是两条互不交织的平行的线（这么说可能不符合数学定律，但为了方便理解，请允许我这么说），朝廷就是中央，中央的集权与否，与朝廷内部无直接关联。

作者判断君主专制在宋代是有所增强，但又认为，士大夫也在宋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声望，高级官员的权力不断增长。两种“矛盾”的趋势如何协调？宋代君主权力是否真的增强了？这一问题相当有争议，我本人倾向于一种积极的保守态度，认为宋代皇帝的权力在保持平稳的同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有“宪政化”的趋势，但也有反复的可能，主要看历史的长期搏弈，而非一时的起伏，但由于宋代为元代所终结，无论宋代原有关于皇权的趋势如何，都未得到继承。这一点也关照到作者所提到的“宫廷政治”问题，我们既可以将变法的兴衰看成“宫廷政治”影响的结果，也可以转换一个角度，从士大夫集团出发，将“宫廷政治”的变动看成是士大夫集团不同取向的投射，两者又互相影响，牵连甚广，如果先入为主地认为在宋代皇帝在实际权力运作中享有无上地权威，在方法论上是危险的。

日本学者东一夫在1970年的王安石变法研究综述中，认为本书作者的观点：王安石是一个官僚政策的理想主义者，是把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作为主要目的，提倡在职业上训练有素的官僚主义政治思想家。因此判断，作者否定了王安石变法的社会主义性质。这里其实有一个误解，且误解可能出自于本书作者的表述。“官僚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否与现代所赋予其的诸多已有概念相联系？就我看来，本书对此的用法，尤其是对王安石本人的理解来说，它首先是中性的，意味着一种“体制性”、“结构性”的制度逻辑。作者使用“官僚主义”来描绘王安石的理想，是说其变法相当程度上是期望通过对官僚制度的变革来实现儒家的道德社会（也就是其他一些论者以为的“社会主义”色彩）。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王安石的“官僚主义”是方法论上的，而与价值观无关涉，更谈不上否定“社会主义”的取向。

于是，我们总结作者的切入点和主旨，主要是从“官僚体制”出发，来理解王安石变法，这也是为何作者选择了“募役法”作为个案的研究。作者当然也对变法的经济背景：如货币经济的扩张因素有所关注，但与“官僚主义”这一重点相比，仍不算中心。

总的来说，我认为作者确实实现了“为一项详尽而权威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杨联陞），但看法并不全面，甚至在某些地方的理解上，存在着误导性的偏差。倘若我们今日要再试图理解王安石变法，非得结合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等诸因素，从理解宋朝的大背景出发，站在本书的肩膀上，向前作出努力。